

编者按 辛亥革命史研究曾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从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开始,国内基本上每“逢十”都要举行重大的纪念活动,有的还是海峡两岸联合举办,新领域不断开拓,新热点不断形成,新专题不断产生,旧专题新论层见迭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我们特意组织了一组笔谈,涉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民族资本主义、会党、民初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这组笔谈准确把握已有研究成果,观点新颖,论证严密,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笔谈

摘要: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革命家。李恭忠《孙中山:英雄形象的百年流变》一文,梳理了孙中山领袖形象的形成过程,阐释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定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沈世培等《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一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解读,认为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会党是晚清时期的重要社会力量。梁家贵《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阐述了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原因和意义,分析了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的缘由。辛亥革命促使中国慈善思想发生嬗变,传统慈善事业开始了新陈代谢过程。蔡勤禹《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一文,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慈善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认为这种转变是中国从传统慈善事业走向以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前提的社会保障事业的过渡,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地位。

关键词:辛亥革命;孙中山崇拜;会党与革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末民初的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1)05-0028-15

孙中山:英雄形象的百年流变

李 恭 忠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一提到孙中山,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一位崇高、伟岸的革命领袖形象。孙中山在大陆的“标准像”依然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高举的现代历史伟人像,第一个就是孙中山。在台湾地区,孙中山更是迹近神话世界里的英雄。时至今日,他的标准形象依然是庇佑“中华民国”的“国父”,台湾地区历届政府领导人就职都需要面对孙中山遗像宣誓、行三鞠躬礼。2008年台湾地区再度政党轮

替,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九上任第三天即率一众僚属,前往祭拜“国父”孙中山,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宣示继承辛亥革命薪火、接续民国“国祚”之意。

这种近乎神格化的英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什么内涵?在科学文化日益昌明、公民教育趋于普及的现代社会,脱胎于近现代历史土壤的这种英雄形象是否还具有什么意义?值此辛亥革命百年“大集”,各种纪念文字纷呈杂出之际,回头对这些问题稍做梳理,对于深化我们

收稿日期:201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SH001)

作者简介:李恭忠,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政治文化史研究。

对孙中山、辛亥革命乃至 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史的思考,或许略有补遗之益。

一、孙中山英雄形象的本来基础

孙中山英雄形象的产生,自然与其开风气之先、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连。他出身于华南下层农民家庭,成长于当时尚属帝制中国边缘的檀香山——香港华侨华人社会,耳濡目染的也是当时尚属边缘的西学教育和基督教网络。这种身世背景,使他无缘跻身当时的主流士大夫群体。但从 19 世纪晚期西政、西学、西潮逐渐冲击乃至颠覆中国传统政教礼制的趋势来看,这种背景客观上又为孙中山提供了从边缘中崛起的可能机缘。孙中山恰好没有错过这种机缘,年少之时即颇显示出抗争意志,并随着求学生涯和师友网络的渐次展开,逐步形成了愈益强烈的革新抱负。早在 1894 年,当清朝统治集团的“自强”运动仍然停留在器物层面,康有为等少数思想家的君主立宪政体设想尚处于小范围拟议之时,孙中山即已成立了秘密组织兴中会,打出了共和革命大旗,并在一年之后策划了第一次武装暴动——1895 年广州起义。此后,孙中山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宪政共和政府的革命道路,而当时中国几乎还没有其他人知道“革命”为何物。

时间步入 20 世纪,历经庚子拳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被迫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出洋等一系列事件,中国的政治思潮风向为之一变。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在朝野精英层当中获得一定认同,马上就出现了更为时髦的风向——共和革命。就连曾经的维新派主将梁启超都转而倡言革命,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文字,促成了革命理念在大批青年(留日)学生当中广为传播。到了 1905 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十年前即已揭橥共和革命大旗、早已在国际上奠定其东亚革命先驱身份的孙中山,虽然没能由此确立对各个革命派小团体的有效领导权,但还是成为整个革命阵营的“最佳形象代言人”。经过革命派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及至清王朝在多重压力之下最终瓦解、新的共和国家破壳而出之时,孙中山作为各个革命派别最能接受的人选,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登上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然而民国国情变化多端,仅仅三个多月之后,他就解除了临时大总统职务,换来的却是袁世凯对共和制度的背叛。于是,民国“出生”之后的十多

年里,他始终以护卫民国为己任,一再奋起,进而组党领政,退而寻求“主义”的完善,历经挫折,始终坚持不渝。这种不断求索、愈挫愈坚的精神和态度,在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当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直至晚年,孙中山终于明确了三民主义为本、借鉴苏俄模式、“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国民革命道路。可惜的是,还没有看到这条新道路的成功,孙中山即遽尔病逝。不过,他留下的这套革命建国方略最终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绪一直延伸至 21 世纪的今日。

可以说,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前期中国政治和社会急剧变革、形形色色人物潮起潮落的大背景下,孙中山的一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诸多重要节点上,总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显得技“先”一筹。这种先人一步、跌宕起伏、贯穿始终的传奇革命生涯,正是孙中山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之本来基础。

二、孙中山英雄形象的初期生成

孙中山的英雄形象并非纯为自然形成的,而是有一个人造的过程,即不断型塑、强化和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孙中山的实际革命生涯相互交叉,但又远远超越了孙中山的个人生命周期。其中有两个阶段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个重要阶段是 1894 年至 1903 年,孙中山公众形象从无名小子到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中的关键环节是 1895 年广州起义,以及次年“伦敦蒙难”事件的国际传播效应。

1895 年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不要说在中国和世界舞台,就是在香港、广州一带,也没有多少知名度可言。从主流官绅的眼光来看,他只是一名出身低微、职业可疑、身份莫名的年轻人,虽然少数密友知道他经常“高谈时政,放言无忌”,但在时人看来,他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然而,这场流产的广州起义帮助明确了孙中山的身份,并抬升了他的政治影响力。事件发生后,清朝政府将他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活动,欲将他逮捕而后快。清朝政府这种过激的应对措施,恰恰把原本默默无闻的孙中山推向了国际舞台。

尤其是 1896 年那场手法拙劣的“伦敦蒙难”事件,不仅使清朝政府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害,而且

让孙中山一夜成名。关于孙中山为何会被囚禁于清朝政府驻伦敦的公使馆,曾经有不同的说法。根据黄宇和教授近年来的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是使馆人员将孙中山绑架,秘密关押于使馆内多日,并试图将他遣送回中国进行惩治,后来迫于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才将他释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绑架事件,让孙中山“成了当时世界中心——伦敦——传媒的宠儿”^{[1]11},“从一个落荒而逃的反叛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当世大英雄’”^{[1]93}。孙中山趁热打铁,在英国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下,迅速撰写、出版了一部署名孙逸仙的英文著作《伦敦被绑》,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文版《伦敦蒙难记》的母本,将一位矢志不移的东方革命英雄形象描绘得丰满而生动。这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仅为英国大众的好奇心提供了及时的“食料”;更重要的是,也为那些持类似抱负、走相似道路的各国(包括中国)人士,提供了一份藉以相互了解、互为提携、相与鼓劲的重要媒介和资源。1897年,该书由俄国政治流亡者翻译成俄文出版;1898年,由日本泛亚细亚主义行动家宫崎寅藏翻译成日文,在《九州日报》连载;1903年,又由正在热烈鼓吹革命的章士钊译成中文,编入其《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在上海印行。

特别是章士钊这本书,把孙中山描绘为“东亚第一人”。书中引用宫崎寅藏的话,热情洋溢地称赞孙中山“何其思想之高尚,识见之卓拔,抱负之远大,情念之切实。……其人诚亚东之珍宝,其言诚革命之律吕哉!”秦力山为该书作序,表彰孙中山在举国醉生梦死之时,“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章士钊自己的序言则宣称孙中山是公认的“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第一人的形象,有赖于19世纪末英国大众传播业的发达,借助了戏剧性的“事件营销”效应而树立起来,并通过跨国人际网络的辗转传播,最终“出口转内销”,于20世纪初革命思潮方兴未艾之际适时“回流”国内。这其中既有孙中山及其亲近人士有意为之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和时代潮流无声推动的因素。这样一种英雄形象,虽然

有人为拔高和虚饰的成分,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孙中山,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之中,与生活的世界血脉相连。

三、孙中山英雄形象的后期再造

孙中山英雄形象生成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他逝世后的十余年内,从略显黯淡的前开国元首到现代救世主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内容是国民党对孙中山崇拜的制作和推广。

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直至1925年去世,孙中山的公众形象其实有点黯淡。他虽然坚忍不拔,屡仆屡起,但在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的国人眼里,多少摆脱不了失败者的印象。这在梁启超于孙中山逝世之际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得到印证。1925年3月13日,北京的《晨报》刊登了一篇长文《革命先觉者孙文竟溘然长逝矣》,报道了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梁启超着重表彰孙中山个人品质方面的优点:意志力坚强、长于应变、操守廉洁。但在梁启超看来,孙中山总体上只是一名选择了错误道路的失败者。“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阵营之外各方团体和个人致送的众多祭、挽文字也传达了这样的感觉。人们纷纷称颂他为“创造新中国的伟人”、“手创民国的国魂”、“治国良医”,但却普遍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失败的感觉,为他的救国事业未成感到惋惜、忧虑,甚至感到前途黯淡。曾经受过孙中山打击的广东商团,在他逝世之后攻击他为“国之罪人,粤之公敌”,公开反对北洋政府授予他国葬荣誉。这同样是看到孙中山最终依然未竟其功,才公然显示出如此恣肆的态度。

国民党自然不能任凭孙中山的身后形象如此低落。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就纷纷称颂他的光荣与伟大,把他与孔子、列宁、华盛顿相提并论,甚至宣称他“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他们还在宣传文告中喊出了“国父”的名号。国民党人在北京为孙中山举行了大规模的丧礼,并在海内外开展悼念活动,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革命主张,努力以“国民革命”导师的形象来区别、盖过当时人心目中各种更为黯淡的孙中山形象。

随后几年里,国民党逐步创造了一种孙中山崇

拜 核心内容是公共场所悬挂孙中山遗像,凡是集会开会之前都要宣读孙中山遗嘱,每个礼拜定时举行“总理纪念周”仪式。所谓总理纪念周,就是要求国民党所属党政军组织,每周一定时举行纪念活动,具体程序包括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默念三分钟,同时宣读孙中山遗嘱,官长演说孙中山革命历史和思想。随着国民党统治范围的扩展,“总理纪念周”这一仪式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渗透到党、政、军、学、群,乃至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套崇拜制度的推行,在扩大孙中山形象影响范围的同时,也为孙中山形象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使孙中山英雄形象形成了一个核心模板,即标准遗像和文字遗嘱。

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正式规定“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由此,孙中山就不仅仅是一位过去的英雄,更是现实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国民党并且借助孙中山遗体最终在南京紫金山安葬的机会,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总理奉安大典”,试图为孙中山做出盖棺定论: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之伟大的革命事业,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之伟人,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国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本诸此种基调,孙中山就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更是永恒的圣人、天上的神祇了。

国民党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推广孙中山崇拜、营造孙中山的伟大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辅助权力建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立志再造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然而面临的现实处境却是派系分立、组织涣散、政权分裂、民心不齐,更遑论外敌的窥伺。于是,国民党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系统的领袖崇拜灌输来帮助统一内部意志、提升自我形象、增强国家认同。这种努力推动了孙中山形象的普及,使之逐渐成为华人世界共知的现代民族英雄。不过,与此而来的则是孙中山形象的固化、神话乃至圣化,不允许讨

论,更不允许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被供奉于高高的神坛上,离生活的世界、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对于常人的意义也就越来越模糊。

四、英雄情结的世纪回响

1949年以后,孙中山的英雄形象在海峡两岸依然延续下来,但却仅仅剩下政治象征意义。在台湾地区,蒋介石时代突出的是他个人的权威,孙中山虽然还是被尊崇的头号历史英雄,却只是作为衬托现实的“背景墙”而已。最直观的例子是,“国父”孙中山像悬挂在“总统府”大礼堂正面墙壁上,默然注视着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宣誓就职和权力表演。

孙中山英雄形象之于蒋介石现实权威的衬托关系,其实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蒋介石的权力尚未完全巩固之前,他需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总理”形象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挟“总理”余威而号令全党乃至全国。经过十余年的权力竞逐,到了全面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权力已经巩固,自认为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唯一正统的继承者,于是修改国民党党章,为自己设立“总裁”一职,代行“总理”职权。从此,孙中山这尊领袖像的实际功能就消失了,只剩下纯粹象征意义,岂能不成其为“背景墙”?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大有变成“孙中山”第二的势头。蒋介石去世后,一首曾经在台湾地区广为流传的“蒋公纪念歌”,试图这样为他做出盖棺定论:“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您是自由的灯塔,您是民主的长城。……您不朽的精神永远领导我们……”,语汇变了,但其中描绘的英雄形象却与当年蒋介石主导下描绘的孙中山形象颇为相似,都是佛面金身、高居神坛之上、与普通民众生活两不相顾的神祇。

然而,时代潮流在变动,“蒋介石”毕竟没法完全变成“孙中山”。最直接的差别就是,“孙中山”有着与此形象相匹配的恒久栖息之所——南京中山陵,而“蒋介石”尚无相应的恒定栖息之处——在台湾慈湖只是“暂厝”,即便如此,仍然不时招致骂声。深层的差异是,“孙中山”无疑已经成了公认的英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而“蒋介石”是英雄?还是其他?过去与现在,大陆与海外,以及台湾岛内,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

究其原因,孙中山身后的时代,正是一个呼唤

英雄的时代。当时中国刚刚步入一个现代国家的生长期,在强化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需要借助英雄形象的塑造辅助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建构。黄帝、班超、岳飞、文天祥、郑和、郑成功、洪秀全等一大批古代人物乃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都曾经被纳入民族英雄叙事的系谱。孙中山作为最知名的现代革命领袖,自然成为这一英雄系谱中的绝佳人选。与此相应,一座融合古今中西、强调公共参与的陵墓——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唯一使用“陵”字的政治领袖墓葬——在南京东郊依山而起,那里既安住着孙中山的个体生命,更寄托着一种对于现代国民国家的认同。时代的变迁没有驱散这种认同,反而让它沉淀为一种深邃的集体记忆,嵌入了海内外华人的心灵结构。西方学者往往将这种英雄叙事化约为“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需要”^[2],固然是旁观者清,但也反映了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体验和民族情感的隔阂。

相比之下,由于科技文化的进步和公民教育的普及,在蒋介石身后,一个大众化、民主化的“去魅”时代很快来临。在这个时代,神话不再为人痴迷,魅力权威消解,英雄回归平淡。在此情形下,从英雄时代走来的“蒋介石”便遭遇了“后”英雄时代的困惑,陷入了某种“英雄困境”。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以及与“蒋介石”相似的曾经的“英雄”们,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走出这种“英雄困境”?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黄宇和. 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 三民主义思想探源[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 [2] 白吉尔. 孙逸仙[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425.

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沈世培, 肖宗建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研究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 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 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有其合理性, 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 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 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 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前一种研究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 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用。后一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生产力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 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我们只有从世界近代史角度, 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把辛亥革命放在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 才能使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个合理的定位。

其二, 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了帝制,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 可以看到, 15世纪以后, 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 到20世纪初, 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 如何进行工业化是个大问题。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用”, 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 运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工业化尝试

收稿日期: 2011-05-11

作者简介: 沈世培, 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肖宗建, 硕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学专门训练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或在大学任教,或在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任职,如卜凯(J. L. Buck)、戴乐仁(J. B. Taler)、步济时(J. S. Burgess)等,他们以所学知识对中国贫穷问题、社会问题和乡村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开出极具针对性的“药方”,使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更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在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科

得到快速发展,一批中国本土社会学家崭露头角,社会学科在大学建立,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内容的社会调查所在一些城市成立。这一切都直接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and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责任编辑 潘亚莉)

Discussion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Li Gongzhong¹, Shen Shipei², Xiao Zongjian², Liang Jiagui³, Cai Qinyu⁴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410000;

3.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4.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Sun Yat-sen was a great revolutionary. Li Gongzhong's "Sun Yat-sen: the Fluctuation of the Heroic Image in the Past Century" summariz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un's heroic image of leadership, and explains it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well as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society. What effect did the Revolution have in the 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apitalism? Shen Shipei's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italism", based on related data, holds that "the Revolution had long-term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italism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which lasted into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ecret parties were an important social pow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Jiagui's "Secret Partie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expounds why the secret parties follow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ists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that resulted in their separation. The Revolution prompted a change of Chinese thoughts on charity. Cai Qinyu's "The Change of Charitable Thou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charity thoughts in modern times, holds that this change was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charity from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 to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social security, and an indispensable loop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ity.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worship of Sun Yat-sen; secret party and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italism; the char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